

滇南抗战：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历史丰碑

张帆



在云南的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云南战场包括滇南战场和滇西战场两部分，滇南抗战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各族人民在滇南抗战中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共筑钢铁长城，是中华民族团结御辱的具体展现和生动诠释，是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历史丰碑。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征服亚洲的“南进”计划，在越南海防市登陆后，在中越边境部署10万兵力，欲以优良装备和速战速决策略，沿滇越铁路两侧夺取昆明，切断滇缅公路，进而夺取中国抗战大后方。此时云南省内只有7个步兵旅，一旦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将难以抵御。云南局势一时风起云涌，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向中央发“特急”电：“日军入越，已成不可避免之势……而在滇防守之师，亦嫌单薄，中日相战……不能不特别注意”。同年11月，由卢汉担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次年春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遣了一个参谋团到云南，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派出机构，制定《滇南防守计划》，协助滇南抗战，掀开了滇南抗战的序幕。

第一集团军采取防御作战思想，因而滇南战场以战略防御为主，主要利用滇南险要地势及红河的天然阻隔，严格封锁各个隘口，沿重要战略地点布置军事防御工程，阻隔日军步步逼近。滇南地区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区，生活着彝族、傣族、壮族、哈尼族、白族、布朗族、布依族、佤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各民族生死与共、休戚与共，滇南抗战的胜利，离不开各民族的踊跃参与和支持。在国家危亡之际，各族人民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意识与历史责任感，踊跃报名参军，爱国主义精神在各民族间“润物细无声”，极大地影响了滇南抗战的局势。

1939年2月，政府面向文山广南、富宁等民族地区征召志愿兵，有青年纷纷响应，当年就有4000余人报名参军。

1940年6月26日《开远各乡镇出征军人家属调查清册》记载，开远县下辖15个乡镇出征士兵达1338人。滇军第60军下辖182、183、184师，182师师长安恩溥和184师师长张冲是彝族。第60军共有4万将士，其中彝族将士2.4万人，占比60%，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仁人志士激昂的抗战热情。据《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记载：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期，建水县各族人民对日寇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各族儿女纷纷报名参军，从1935年至1945年，共计有6565人参军入伍。面对日军的侵略，各族人民共赴时艰、踊跃参军，彰显中华民族大无畏的精神与勇往直前的气魄。

在抗战中，各族人民相互信任、团结友爱、不分畛域，民族情感更为浓厚。元阳人马正兴讲述道：“王元珍会听哈尼话、彝族话、汉语，但没有谁会说傣族话，只好规定在训练中允许傣族人先看好大家的动作再跟着大家一起做。为了训练，一些民族兄弟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爱留长辮子、穿大裤裆、系树皮草绳的生活习惯”。在《抗日战争时期防守滇南的第一集团军》一文中，参加滇南抗战的严中英回忆道“江外（指红河右岸）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大敌当前，各族人民起而保家卫国，我军居民以走亲戚、做生意之机，混入越境，侦查敌情……我滇南军民同仇敌忾，士气旺盛，各部队坚守阵地，以逸待劳，并加强搜索敌情，准备好抗击消灭来犯之敌”。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纷纷牺牲自我，顾全大局，为滇南战场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地方土司也纷纷要求组建边防游击队，协守疆土、抗敌御辱，负责滇南防务的总司令卢汉予以积极的回应，滇南各民族抗日队伍一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彝族通史》记载，卢汉委任纳土司龙健乾（哈尼族）为边防游击队总司令，糯吾卡土司龙腾鹏（哈尼族）、猛弄土司白日新（哈尼族）、敦厚里（普告龙、新街）区长普家喜（彝族）3人为副司令。白日新、普家喜等获得卢汉允许，联合思陀

甸土司李呈祥（哈尼族）、迤萨土绅代表姚虞卿、溪处甸土司赵桂生（哈尼族）、永乐土司普国泰（彝族）等，单独组成以白日新为总指挥的红河南岸抗日游击队。1942年11月，猛弄土司署召开成立大会，共商抗日事宜。

在滇南地区，各族人民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共有八支，司令均由地方土司担任，他们积极守土抗战，有力支援了正规军在滇南的防御作战。日军完成进攻部署后，派出特务潜入我境侦察，并进行试探性进攻，但都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滇南防线固若金汤，日军见从滇南发动进攻已无可能，只好改从滇西方向发动进攻。滇南和滇西两个战场一脉相承，没有滇南战场多民族强大的防御，就不会有滇西战场胜利号角的吹响。各族人民积极参军，对滇南军事防御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间接协助了滇西战场的抗日活动。

在滇南抗战的关键时期，各族人民纷纷展现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气节，为抗战捐钱献物。《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记载：1940年，由政府组织，在元阳成立了抗日游击第二大队，国民政府仅发给仿造七九步枪100支，不足部分由地方自筹。地方土司下令各族人民买枪支援游击大队，每支步枪买价为半开（半开为云南铸造的小银圆）150至200元，钱由百姓出，枪归公用。同年，元阳县糯吾镇为抗日缴纳电杆款半开240元，缴纳公路款半开5000多元；负担驻军夫马、旅杂费半开1.8万元；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委任勐弄土司白日新为滇越边区抗日第一游击支队副司令兼第三大队大队长，在各族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得以与日军周旋。

《蒙自县志》也记载有各民族积极支持抗战的光辉事迹，“为支援抗日，蒙自县组建骡队5个，驮骡51匹；马队17个，驮马244匹；牛队5个，驮牛97头；14个牛车队，牛车338张”。同年，为宣传抗日，金平县分别建阿得博学校、妈卡坡学校，百姓

支持40石谷子，作为阿得博学校教师伙食及笔墨纸张的费用，百姓捐给妈卡坡学校办学谷子80驮（每驮130斤），独家村何汝高老人拿出20驮支付课桌椅。同年，蒙自地方绅士周子荫捐资国币10余万元，驻蒙滇军第60军捐资数万元，修复了1941年4月18日被日本军机炸毁的省立蒙自第三模范中学教学楼。以上种种，无不是各民族团结抗战的有力证明。

各族人民积极支持抗战的同时，政府也给予鼓励，形成了滇南战场官民互助的抗战格局。1942年3月22日，国民革命军第52军195师师长覃异之，副师长钟祖荫、刘平给路书府的训令称：“溯自抗战，为求全民团结，消灭倭寇，复我河山计……乃查董干汛、官渡乡乡长路书府、铁厂土绅张绍云，自本军驻扎各该地后，对于军需品之征发及给养之输送，莫不尽更大之协助，以求解决军中之困难，以尽忠职守，热心为国，不愧为良民之表率……除颁发甲级一等奖状外……再传令嘉奖，以励来兹仰仿”，对积极参与抗战的民族地区领袖，给予了嘉奖和鼓励，是官民一心团结抗日的生动写照。

1943年9月7日，弥勒县长王承忠接陆军第82师师长吴剑平由泸西发来的电报：“本师即日到竹园，请运送大米1200包到驻地，并代请雇驮马150匹、民夫200名，请按数预备马粮。”10日，云南省粮政局局长段克昌要求弥勒县长遵省府议决，照七折给价代购军粮拨补报核。各族人民对抗战的各项帮助与补给，对滇南战场的胜利尤为重要，为此也做出了极大牺牲。仅文山地区7县1区，在1942年到1945年间，共提供军粮3090余万千克。在征调繁重的1943年，昆明行营兵站总监部配建文山各县区承担的军粮为945万千克。1944年，文山地区8县（区）征实采购上交军粮683万千克。

在滇南抗战中，流传着各民族兄弟姐妹并肩作战的佳话，既显示了多民族共渡时艰的深厚情感，又反映了乐观向

上的民族精神在各族人民血脉中的赓续与传承。《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记载了一则红河州的抗日佳话。游击队员薛祚春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被日军围困三天，指挥部已上报失踪，幸得当地老百姓掩护、送给粮食才得以生还。

在抗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各族人民与军队更是没有懈怠。1945年2月，日军进攻麻栗坡特别区，中国守军与日军激战，日军见我军士气昂扬，慌忙撤退。同年2月，第52军第2师第5团第2营营长张文博率领第3连，潜伏在马龙寨日军阵地前，他们截断铁丝网和通信线路，炸毁碉堡，驻守马龙寨的一个日军小队大部分被歼灭。逃出的三个敌人因道路不熟而到处乱窜，两个逃窜到董榜被瑶民处死，一个逃窜到磨寨寨被苗民处决。可见，各族人民对日军侵略行径深恶痛绝，已深深融入了滇南抗战的洪流之中。

滇南抗战不仅是军事硬实力的比拼，更是双方综合力量的较量。我方军民团结一致，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军民一家，住往灵活多变，让敌人束手无策、举步维艰。在滇南抗战过程中，有一件“趣事”。据传，第九集团军为了方便军事信息的传递，在一、二线阵地上架起了军用电话线，日军发现后，多次派出特工深入我军驻地，通过窃听电话信息来截取我军的情报。关麟征将军发现后，立即传令军中，将所有接线员都换成文山县追栗街的彝族仫佬人。这个彝族支系人口少，语言独特，抗战热情高昂，日军因无法破译彝族仫佬支系语言，纵使有先进手段，也无法获取我军情报。

滇南抗战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深厚的爱国情怀与家国意识，已然成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历史丰碑。在新时代，挖掘滇南抗战的英勇事迹，对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七彩云南

地名故事

历史城镇名“建水”的由来——

滇南邹鲁
文献名邦

建水古城外，游客在小挂湖公园里漫步。 本报记者 胡好雅 摄

年(1387)创建城池官署，拓地改建砖城，城周六里三，城墙高二丈五尺，设有四门(东为迎晖门，南为阜安门，西为清远门，北为永贞门)，四门有城楼，楼为三层，各高四丈，非常壮观。清顺治四年(1647)，南北西三个城楼毁于战火，康熙四年(1665)修复，后再度毁损再次复建，唯有东门朝阳楼，建成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虽历经多次战乱和地震，至今近六百年，仍旧巍然屹立，为古城标志性建筑，被誉为“滇府第一楼”。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间改建建水州为建水县，沿袭至今(民国元年改建建水县为临安县，次年复称)。

建水古城以明清砖城为基础，融合汉族礼制建筑与彝族、哈尼族文化元素，至今仍保留“四门三街”传统格局，城内街巷纵横，古建筑密集，涵盖文庙、朱家花园、双龙桥等50余处古建筑，形成“一城七寺八庙九井”的独特风貌，紫陶街、团山民居等区域完整保留了明清商贸与居住形态，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和“民居博物馆”。建水文庙、双龙桥、团山民居、指林寺大殿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元明清时期，建水一度统辖滇南军政事务，商旅兴旺、经济繁荣，获得了“金临安”美称。经济的发展促生了古城“尊孔崇儒”之风，以元代建立的建水文庙为标志，各族民众开始接触儒学。至明代，临安府学与建水州学分别文庙东西，形成“一庙三学”的独特格局，以建水文庙为轴心推行“文治”，以州学和府学为两翼施行“教化”，成为建水的一大特色。儒家治世理念渗透社会肌理，深刻影响了社会发展。至明中叶，建水已跃升为滇南行政中枢与文化高地，有着“滇南邹鲁”的美誉。

已有700多年历史的建水文庙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保存完好，经历代40多次扩建增修，其现存规模、建筑水平和保存完好程度，都仅次于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是我国南方规模最大的

语曰建水，历郑赵杨段皆仍旧名。宋时为些麽蛮酋历所据，未附中国，统于段氏。元初滇内附，置建水千户，属阿夔万户，至元中改建水州属临安路。明初，州志附郭，辖曲江驿，箐口关巡检司编入东西南北，与府辖州县接连纵横……，直抵五邦与交人共江流之险矣。洪武十五年傅友德、沐英定云南，总兵金朝兴平临安”。这两段史料所记，可知建水之名源于唐开元和年间(806—820)，南诏政权在此择高处筑惠历城，每逢夏秋，溪水暴涨如海，因于水边筑城，故称。此处的“涨水”主要是古城西面汇聚于十七孔桥的泸江和塌冲河；南面的西湖，又名草海子，历史上是一片沼泽地。惠历一名后演变为建水，正是取兴修水利之意，反衬了古城周边水系水道众多的地理环境，因此，这也是一个因水而得名的古城。而《元史·地理志》中所言“步头”一词，按岑仲勉《隋唐史》载：为“南方俗语，现在犹呼水陆上下处为水步头或步头”，则步头意即码头，也可从另一侧面说明古城所在的建水区域水系之发达。

古城历史可追溯至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设益州郡置24县，古城属贛古县所辖地。唐末时属通海都督。元至元时设建水州，属临安路(路治在通海)。明洪武十五年(1382)，临安路改临安府，由路治改为府治，治所由通海迁至建水州，故建水城又称临江城。洪武二十

建水古城外，游客在小挂湖公园里漫步。 本报记者 胡好雅 摄

的文庙。2001年6月25日，建水文庙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文庙的建设和儒学发展对应匹配的是建水学政考棚的创建。考棚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至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因原址狭小，知州张鼎昌扩建督学道，与州衙(后为县衙)互易，建水学政考棚移至城东南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土匪为乱，县署被毁，知县梁正麟将建水学政考棚迁建于现址(建中路377号)。学政考棚坐北朝南，面宽40米，纵深150米，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房舍整齐对称，共百余间。整个建筑以南道为中轴线，形成六进院落。其中，一进院为仪门，二进院为龙门，三进院设有大堂和东西文庙，四进院为二堂，五进院为内宅门，六进院为学政公署；厢房为平房，用木板隔成单人考试房，设考场20余个，为国内保存较完整的古代大型考场之一，是研究中国西南古代科举制度的较好实物遗存。在四百多年的历史岁月里，临安府属各州县和元江、开化、普洱的童生和生员，汇集建水，比试锋芒。2019年10月7日，建水学政考棚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城同时拥有紫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彝族花灯、建水小调、烟盒舞(省级非遗项目)等多项传统技艺与民俗文化。“宋有青瓷，元有青花，明有粗陶，清有紫陶”，建水紫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别名滇南琼玉，以“阴刻阳填”工艺闻名，“刻坯填泥”“无釉磨制”的工艺特色形成于清道光年间。陶泥取自境内五彩山，因含铁量高，烧制成的器具硬度高，表面富有金属质感，叩击有金石之声，经过无釉磨光，质地细腻、光亮如镜。明末文人造物之风兴起，至清代建水文风鼎盛，为工匠和文人之间的广泛合作提供了条件。除却文房用品外，以建水紫陶为核心的文化标识延伸到百姓居家生活中，创制了紫陶烹制名肴气锅鸡、草芽米线(鲜嫩草芽佐味小吃)等美食，共同构成“舌尖上的建水”地域品牌，成为古城文化传承与生活美学的生动体现。2008年建水紫陶的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建水·西庄紫陶小镇”被命名为云南省特色小镇。

从朝阳楼的巍峨到紫陶的温润，从科举鼎盛到文旅新生，建水以地名承载文明，以创新续写传奇。

(云南省地名档案馆供稿)

全面系统研究云南农产品品牌的力作——《特色农业品牌化：以云南为例》评介

赵俊臣

近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晓未撰写的《特色农业品牌化：以云南为例》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理论概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国内外实践、综合报告、3篇专题报告、5篇案例报告、10篇已发表文献等部分，是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云南特色农业区域公用品牌的著作，填补了研究云南农产品品牌的空白。该书论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集学术研究和实践提炼为一体，是研究云南区域公用品牌的力作。

深刻揭示区域公用品牌引领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本书作者通过总结云南区域农产品品牌创建的成就与经验，认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是增强云南内生发展动力、带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产品竞争力、资源禀赋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实现的重要支撑；更是提升品牌打造能力、品牌产品市场占有率、溢价能力，品牌引领提升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措施；是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支撑。这一概括非常精辟，对促进云南乡村全面振兴具有指导价值，让农产品品牌建设赋能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准确概括出品牌引领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机制。作者认为，云南品牌建设是在中央品牌决策的指导下推进的。2018年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通过集全省之力打造省域公用品牌的组织机制，明晰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标识，构建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标识管理办法、品牌目录制度、区域公用品牌奖惩机制、品牌支撑机制、品牌营销机制，逐步将“绿色云品”打造成全省域全品类的省域公用品牌，其做法和经验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意义。作者依据云南普洱茶、昭通苹果、文山三七、华坪芒果、七彩云南等省域著名品牌的经验，肯定了云南农产品品牌创建机制，打造“绿色云品”市场化宣传推介平台。同时，本书作者充分肯定云南品牌多方位、多形式的宣传效果。如广泛开展绿色食品品牌整体形象宣传，积极组织云南品牌评比活动，扩大品牌农产品美誉度和影响力，提高社会对云南绿色云品的认可度。创新品牌农产品营销方式。充分发挥各类展销会以及新闻媒体的作用。

在揭示存在的薄弱环节方面有许多新发现。作者发现云南品牌建设面临的短板和不足，如品牌运营机制不足，品牌集群效应弱，“一县一业”支撑不足，品牌溢价率低。详细分析了省域品牌“绿色云品”叫不响做不强的原因，如“绿色云品”定位不准，品牌运营机制不足，品牌矩阵尚未形成合力。作者针对存在问题，给出了四大类对策建议，这些建议都很中肯，值得有关部门重视。一是产销管分离，强化品牌运营。二是理顺机制，重塑“绿色云品”矩阵。三是健全完善区域公用品牌支撑体系。四是强化科技支撑，打造绿色食品全产业链。

高度重视企业家在品牌创立、提升、传播和巩固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本书作者针对云南农村发展人才短板问题，建议培育农村创业带头人，抓住了要害，要高度重视企业家在云南农产品品牌创立、提升、传播和巩固过程中的关键地位与作用。珍惜品牌，更应该善待、保护企业家和品牌企业，为企业和企业家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尤为可贵的是创造保障有力的法治环境，营造和谐优化的政商关系。

参与国际间竞争的一个可行途径是与跨国地名品牌合作。本书作者肯定云南农产品出口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二，西部省区第一，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名气，建议云南扩大国际合作。

作者长期研究云南农产品品牌，发表了系列论述品牌的文章，为云南农产品品牌建设贡献了智慧，值得研究品牌的专家学者借鉴和实践部门推进品牌建设提供参考。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

